

陳果夫的祕密

董中生

——七省主席幕中記之四

政情報告兩顆縣印

我第一次看到陳老師果夫先生，是民國二十二年多，在南京四象橋浙江會館。聽他向政校地政學院學生演講。

果夫先生是政校的校務委員，而且是最關心校務的委員，曾兼任教育長。政校由中國國民黨設立，主要任務在培養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行政幹部。果夫先生在黨內地位，特別重視這所學校，亦是理所當然的事。

地政學院招收大學畢業學生，每期約二三十人。專門研究地政二年，培養執行三民主義土地政策的專門人才。

那次聽演講的就是我們一二兩期六十幾位同學。浙江會館不大，所謂禮堂，實在就是一間小教室。

果夫先生時任江蘇省主席。政校一二期畢業同學多半派在江蘇省工作，因此我們對他的演講格外重視。

演講時間未超過半小時，內容全是些家常話。鼓勵我們用功研究，並報告一點江蘇省政情。

講話時偶爾還帶幾聲咳嗽。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手拿着一個小罐筒，咳嗽時將痰吐進罐中，再將罐筒放回衣袋內。

當時我有一個小疑問：「放在衣袋內的罐子，如何能使吐進去的痰不流出來？」曾和幾位同學討論，可是得不到結論。最後一位同學說：「這是一個大祕密，除非有一天果夫先生自己將這個祕密公開！」學生們由於好奇，或許亦有實際需要，很喜歡聽江蘇省政情報告。果夫先生演講後，我們找機會向上課老師問這方面問題，有幾位教授為了答應我們問題，甚至正課都不上了。幾乎以全部時間談論江蘇實在的故事。例如教政學近年在台北逝世的劉振東老師（劉時任政校財政系主任），就是如此。

學生們最愛聽的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大問題，而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時隔半個世紀以上，至今尚能清楚記憶，且趣味性較高的故事，寫幾則如下：

①二個縣印：果夫先生選任縣長，較為注重學識、品格，而不太注意經歷。一位毫無行政經驗的黨務工作者，發表為江南某一小縣初任縣長

。他認為縣府內最重要的物件是縣印。因此就請自己夫人監印，保管縣印。

一切公文及田賦糧票等全要蓋縣印。印用久用多了顯得模糊不清，幾乎到了認不出其中的字了。女人做事心細，她把縣印拿來洗刷乾淨。正當洗淨未乾，一位文書先生提件緊急公文來用印。時在嚴冬，房內設有火爐，夫人就將銅的縣印放在火爐上烘乾，然後在公文上加蓋印。

後來經人發現這張公文上的縣印，比其他公文上的印大了許多。懷疑縣政府備有二個縣印，一定是縣長另有作用。向省政府及有關機關指控。省府派人查了半年，並未發現再有第二張蓋較大縣印的公文。最後還是由縣長夫人說明原委，才真相大白。

②機密文件：江寧地方自治實驗縣長梅思平，原任政校行政系主任（後附汪精衛偽組織）。書生從政，當然沒有行政經驗。接事不久，在縣長辦公室接到一件公文，封面上蓋有「機密」二字戳記，他趕緊將這件公文放進隨身手提包，準備帶回家晚上拆閱。

拆開一看，乃是一件無關緊要的通令。空緊

張一暉，縣府會經常收到此類有「機密」戳記公文，內容實在與機密無關。

③如夫人干政：果夫先生組織江蘇省政府，省府委員及重要廳處局長，全由與黨關係很深同志出任。唯有民政廳長，則由曾任任行政督察專員，剿匪頗具績效，經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楊永泰氏推薦的辜仁發擔任。

辜廳長的如夫人，介紹她手帕交姊妹的夫婿，由民政廳發表為無錫縣警察局分局長。此君自以為有民政廳作靠山，時與局長衝突而被撤職。如夫人挺身而出，支持該分局長。最後辜廳長與他的如夫人分手鬧到法院，供給京滬一帶報章雜誌製造熱鬧新聞，直到辜廳長辭職為止。

縣警察局分局長，由民政廳直接委派，是抗戰前新縣制尚未實行前的事。那時縣政府各局的專業人員，規定由省府及主管業務的廳處局委派。例如我民國二十五年任吳縣（即蘇州）地政局長，就由省政府主席陳果夫名義派任。局內業務人員亦由省地政局直接委派。直至抗戰開始後，為提高縣長職權，實行新縣制，裁局改科。縣長才有依法任用縣政府人員的全權。

由省廳處局直接委派人員的優點，是省能統籌供應管理全省該項專業人員。壞處是省派人員易與縣級主管相處不融洽。蘇州地政局我的前任，就發生局長與省派督導員摩擦，因省局長與督導員私人關係較與縣局長密切，促成縣局長辭職，由督導員代理縣局長的非常事件。

縣地政局的業務上級機關是省地政局，行政上則隸屬於縣政府。我接任蘇州局長不久，一位

縣政府服務的政校同學告訴我：

「縣長鄧翔海（湖北人）是一位非常精明幹練的長官。」

他舉一個例證明：「駐蘇州的保安大隊長是由省保安處派的，和前任縣長不和，而使縣政處理非常困難。鄧縣長到任後，表面上和大隊長很合作，私下却親自辦件公文（縣府內無人知道），直接函呈果夫先生。等到這位大隊長接到被免職命令，自己尚不知其中原委。」

果夫先生很器重鄧翔海縣長。抗戰開始，調他任侍從室三處組長，並先後出任新疆、湖北二省府秘書長。

張一鑾一語息風波

民國二十五年某日，是江蘇省地政局成立三周年，及局長就職一周年紀念日。由省會所在地鎮江縣地政局長發起，通知全省各縣局長一定要親自來省會參加，隆重慶祝。並附帶要求每局備送一項永久紀念性的禮品。蘇州是全省最大的縣地政局，希望能送一個純銀製造的銀鼎。因為蘇州銀樓的手工藝是全國聞名的。

一個純的銀鼎，時價在一百銀元上下，將近我一個月的薪水。我當局長、縣長等機關首長，每月祇領薪水以維持個人及家庭生活。辦公費全由總務人員負責管理支配，我從不過問。還有一個原則，不用自己私人主辦總務。

送不送銀鼎，局內同事意見不一。政校剛畢業的張雲漢主張不送。唯一由嘉興隨我來蘇的總務課長何瑀京（蕭鍾師介紹），則表示如果其他局

皆送，我們不必獨異。錢可徵詢局內同仁同意，然後分擔。結果就按薪水高低比例分攤，由全局職員出錢送了一個銀鼎。

這是我一生唯一向上級送禮的一次。以後我決定寧儘可能努力工作，以博上級重視，而不再送禮求取上級歡心！因為這次送銀鼎，錢向職員分攤，後果非常惡劣！尤其低級職員，口雖不公開講，心裏却確實看低我這個局長的人格了。

那次慶祝會辦的有聲有色，相當熱鬧，除設席歡宴外，並有名票參加平劇公演二天。省局長很滿意，籌辦的人更認為辦的很成功，但據聞果夫先生事後知道，不以為然。

果夫先生主持江蘇省政，用新人，建立各種新制度，一時形成新風氣。在短期間內蘇北的地方治安大有改進。江南各項建設，亦紛紛起步，掀起國民黨領導政府的新希望。

如就地政而言，果夫先生雖然全力支持，各縣除辦測量、登記外，尚無突出成績表現。國民黨土地政策的實行，要等到大陸失敗後，才在臺灣實現，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吳縣縣長鄧翔海先生，在我初到任時，對縣地政局表示不大滿意。直到有一天縣府主計主任鄧傑（政校一期同學，湖南人）告訴我其中的原因。

過去土地買賣，雙方訂立契約。縣府財政科即按契約內載明的房地產徵收契稅。自從地政局辦理土地登記後，按照土地法規規定，登記有絕對效力。地主領到土地所有權狀後，產權已獲得完全保障，就不再向徵稅機關驗契約了，因而使契稅歉收，影響到財政科長的考績。當時吳縣財政科

長是省財政廳長的連襟，縣長很重視這件事。但法令如此規定，他亦無能為力。

鄧傑非常幫我忙。他一面向鄧縣長說：「既是法令規定，那就不能怪地政局長了。」一面私下和我商量：「可否由我每月秘密抽出登記處內的大宗買賣契紙數張，將買主的姓名、住址，及土地座落、賣價等開張便單，親自面送縣長（洩漏消息會影響地主來登記的）。縣長對外表示：這乃是由他自己設法調查所得的資料，交財政科派員催買主前來繳稅。」

上述辦法，鄧縣長認為很滿意。後來我由蘇州調往湖北工作，他還自動為我寫信介紹他在湖北省政府服務的胞弟鄧翔宇（現任立法委員，在臺），囑他對我多加關照。

蘇州女孩子，多溫柔貌美。政校同學單身來蘇服務者，臨走時不少是帶了蘇州太太一同離開的。鄧傑雖亦隻身在蘇州，却全心全意工作，一副老夫子態度，不去追求女朋友。閒暇無事，常來和我敘談。

任蘇州局長年餘，其中登記處遺失契紙一案，鬧得滿城風雨，幸經地方士紳張一塵老先生主持公道，一語平息風波。

蘇州士紳，尤其老一輩的，他們學識、經驗豐富、人生觀修養高深。對我們年輕後輩，願多指導幫助，是服務其他地方難以得到的機會。例如我調往湖北離開蘇州前，向李印老（根源）辭行，他自動提出替我寫幾封介紹信給湖北省府各廳長。

當時湖北省府廳長，多由前任主席楊永泰邀

請，是政學系的重要人物，而印老是政學系的首腦，拿他的信去見各位廳長，頗有功效。

財政廳長看了信，就說：「我們是一個屋蓋下的。」（當時我還不明白這個詞的出處，來美後才知賈士毅廳長是從英文 under one roof 翻譯的，美國朋友喜用此辭）。叫我以後有什麼問題，可以去找他。

湖北省地政局前任楊局長，亦是一位政學系能員，能講善道，後任江西省建設廳長，創設陶陶招待所，旅客稱便。黃紹竑繼楊永泰任主席，他很重視推行國民黨土地政策。商得果夫先生同意，決調浙江省平湖縣地政實驗縣長汪浩來鄂。楊局長聞訊立刻飛南京謁果夫先生，並預向局內同事說：「如果能見到果夫先生，一定可以留任的。」可是果夫先生未曾接見他。

汪浩局長是留俄的，請留美的洪瑞堅先生任秘書（二位都是地政學院的研究員）。局僅設二科。我任第二科科長。

第二科有二位科員，一位是河南大學畢業讀法律的，另一位是武漢大學畢業學經濟的，他們撰辦的例行文稿，毋庸多加修改。至於地政智識隨時和他們研究討論，倒亦甚為融洽。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抵武昌，七月七日對日全面抗戰爆發。當時湖北各縣市尚未展開地政工作。祇有鄂城、大冶等四個縣設有湖田土地登記處。

四位登記處主任，汪局長全派他的湖南同鄉擔任。湖南人到武昌很方便，來找事的特別多。

七月中旬汪局長晉京述職，秘書洪先生和我商量將地政學院畢業派局服務的四位同學，和四位登記主任的工作對調。就是由全部同學出任登記處主任。

這項人事更動，事前並未商請局長同意。因此局內同事批評我此舉是「膽大妄為」。好在抗日戰事已起，地政局本身存在與否，尚且發生問題，大家就不注意這件事了。

八、九月我協助財政廳整理田賦，分起各縣調查研究，並督導徵收。十月初我正在鄂東考察，已風聞地政局將被裁撤，由民政廳設科接辦地政。同時接到局內通知我立刻回局。

局內同仁最後希望民政廳主管地政的這位科長，能由地政局推薦，並推我赴京向果夫先生報告。

十月中旬我趕到鎮江，先見江蘇省地政局長。蒙果夫先生即電湖北省新任主席何成濬將軍。下旬我回武昌，同事告訴我果夫先生的電報是來了，結果沒有用，因為新任主席在紀念周上講話，他說：「這個主席，我是不願意幹的。既然接受了，什麼人的電報，對我亦沒有用！」所講的電報，可能就是指果夫先生來的。

果師推薦我任專員

民國三十二年，我從浙江昌化縣長調任湖北宣恩地政實驗縣長，路過重慶。目的之一是關於地政實驗的事，先向師友們請教。目的之二是到政校邀請地政同學去實驗縣工作。

中央政校時選在重慶市郊小溫泉。我在鎮上找到一家名為旅館，實是家庭住宿。這家將他們的上房供給旅客住宿，兼備膳食。對我倒亦方便。

公共溫泉池離他家不遠。溫泉設備簡單，但這是我有生第一次進溫泉，頗有新鮮之感。

上館子進餐，四川餐館門外多掛二塊小牌子，左是「開堂」，右是「豆花」。「開堂」表示已在做生意了，和美國餐館門前放一塊「OPEN」牌子意義相同。「豆花」表示供應有豆腐腦佐餐。

由小溫泉鎮上通往政校有一條彎曲的小水道，名叫小花溪。備有小木舟，可供一二名旅客乘坐。此溪經政校在其下游築壩後，水位升高，沿岸風景甚佳。

抗戰前我在嘉興、蘇州等水鄉服務，乘船機會多，抗戰以後，服務地方全是山區，來往以步行或騎馬為主，一旦又有坐船機會，頗感親切！

我到學校，先找同學。地政系設有專修科，修業二年畢業。當時大部份專修科同學要求延長為四年，大學正科畢業。但亦有少部份同學主張二年讀完就提前畢業的。他們提前出校，考取高等考試，比大學正科畢業的同學，工作機會可能還好些。

和同學談話後，地政專修科同學，即有幾位願意隨我去湖北工作。例如宋同鋼（安徽人）同學，後來派他任財政科長，王長修（四川人）同學任小關區區長。

果夫先生在校內接見我，他提醒我趕快去湖

北，因為如果遲去，陳辭公恐要飛往昆明了。

果夫先生亦簡單問起浙江的政情，還特別問到逢化文同學的近況，逢化文黨校畢業，曾任果夫先生家鄉吳興縣教育局長。

民國三十三年春，奉調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畢業前夕，軍委會委員長侍三處派吳鑄人先生來報告，大意是：學員畢業後，遇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寫信給果夫先生（侍三處主任），並詳細說明與侍三處聯絡辦法。據說凡是學員去信，侍三處一定立刻回信。

抗戰時期，行政院任命中央各機關及各省重要人事，都經過侍三處附簽意見呈請總裁蔣公核定才發表。此項辦法，頗遭人非議，人們懷疑侍三處所簽意見是否公正？遇到各省主席推薦的廳處長被否決時，更引起封疆大吏們的反感。甚至有人譏諷侍三處等於專制時代皇帝身邊的宦官們！

由於我國尚未具備英、美國家的民主政治基礎，又沒有法、義等國的健全人事制度。英、美的政治人才由選舉產生，一切政治問題，一經選舉決定，全體遵守執行。法、義因有健全人事行政制度，雖政局常不穩定，內閣時有更動，而國家所受影響不大。

像我們這樣一個散漫龐大國家，面對強大敵人抗戰，如果不由一個統一的中央領導，如何能爭取最後勝利？

中央的強有力領導，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共黨深明此理，他們才公開宣佈擁護蔣公領導）。果夫先生在戰時特殊環境，輔佐領袖（

他自己認定國家、黨、領袖是一體的，這正是美國民主人士最反對的一點），忍辱負重，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抗戰是一項民族革命戰爭，由中央，甚至領袖控制用人權，似未可厚非。建國當然要選用歐美最優良制度，實行民主政治，是今天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要求。

民國三十四年，王東原將軍繼陳辭公任湖北省主席，我到省政府謁見。引見的隨從秘書是政校畢業不久的鍾顯堯同學。他招待很親切，他並說：雖是初次會面，我的名字他很早就知道了。

鍾同學政校畢業後，即留在侍三處服務。由於他的文字優美，動筆快，果夫先生就派他替自己寫文章。特別關於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果夫先生自己已有一套改革教育的體系思想，請教當時幾位教育名家，未承他們接受。因為名家們多半已受歐美教育思想影響，成見已深。鍾同學大學剛畢業，沒有什麼成見，所以果夫先生有關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全由鍾同學執筆。

鍾同學湖南人。王東原與湖南關係較他原籍安徽還深切。他向果夫先生請介紹一位秘書，果夫先生就將鍾同學介紹給他。鍾同學的太太活潑美貌，主席夫人亦很喜愛他。

至於鍾同學早知我名，可能是那時我們二人都任政校刊行的「服務」月刊寫文章，他很欣賞我做行政工作很忙，尚有餘力為文。

外省人在湖北任縣長，是不容易的。尤其當陳辭公離鄂後，我自己特別謹慎，希望能找個機會，早點平安離開。我曾將這個想法私下告訴鍾

同學。

出乎意料之外，有一天鍾同學私下通知我，果夫先生函主席推薦我升任行政督察專員。事實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很諒解王主席那時在湖北的處境。無論如何，我對果夫先生的推薦，還是很感激的。

國民黨CC是梅毒？

民國三十六年夏，我赴淮陰地政實驗區任行政督察專員前，在南京又晉謁果夫先生一次。他說江蘇設地政實驗區及派我任專員，他都知道（記得陳辭公曾說，我任湖北地政實驗縣長，亦是果夫先生介紹的）。問我有同學同往工作否？我答：「王非同學已答應去任秘書。」

王非曾任果夫先生原籍吳興縣長。他先找二天已見過果夫先生。王並已告訴我，果夫先生叫他跟我一同到淮陰工作。淮陰是綏靖區，沒有南京安全。一般人皆希望在安全環境工作，尤其經過八年抗戰流浪生活，很少人願意再上前線，再往戰區工作的。王非和我私交很深，加上果夫先生的囑咐，就不再考慮其他，答應我任專署秘書了。

到南京晉謁果夫先生的人很多。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川流不息有人來。秘書們在候客室按先後到達次序簽名，先到先接見。那天漢口市長徐會之後我而來，他是請果夫先生向中央說話，將漢口市提升為院轄市的。我們在湖北省政府一同出席開會。他是遠道而來，我請他先我而見

，但登記秘書認為還是按次序比較好。

據一位任果夫先生秘書的同學告訴我一件有趣的小事。各省來京接洽公事的黨政軍同志，多半要來看果夫先生一次。他整天面對這許多人談話，實在是一件很枯燥而又辛苦的事。所以有時雖然表面上他裝做很留意聽來客說話，甚至手還拿筆好像在簿子上記錄談話要點。其實他是在畫對面談話人的面貌。據說果夫先生畫人像，還真有幾分藝術天才呢！不過我從未見到果夫先生畫的人像。此說不知是真是假。

民國三十六年多，我在淮陰專員任內，突接南京總統官邸電報，通知赴中央訓練團任戡建班的主任生活指導員。

三十七年夏，行政院召開各省主席會議（江蘇全體行政專員列席）。上午蔣公親臨訓話，下午院長張岳公主席決定綏靖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併入綏靖區司令部，我就離開江蘇。

到南京後，戡建總隊邀我任少將督導員。不久戡建隊擴大為青年救國團，我又被任為政治處長及服務處長。

戡建總隊設六個大隊，隊員由大學畢業學生，及各省保送優秀黨、政幹部，經中央訓練團訓練五星期後組成。第一大隊隊員百餘人，分派江蘇沿運河各縣服務，由我兼大隊長。第五大隊分發河北，由范魁書（來臺曾任司法院秘書長）任大隊長。第六大隊派在上海，主要任務為督導經濟管制，由王昇（來臺曾任總政治部主任）任大隊長。二、三、四大隊分派安徽、河南、山東各省服務。

戡建總隊長胡軌（字步日）任救國團主任。

他主持過中央幹校訓練工作，所以戡建班的指導員，戡建隊的中、分隊長，即以幹校同學為骨幹。

中央政府撤退廣州後，步日先生曾邀我同去參加幾次所謂「國是討論會」。

民國三十七年下半年，徐蚌會戰敗象已露。國民黨領導的政府雖實行憲政，基礎顯已動搖。每次討論會，慷慨發言的，不少是由國民黨員名義選出的民意代表，及平時被人認為很忠貞的黨、政、軍重要幹部。例如國防部預幹局長賈某，每次發言，總是痛罵政府及黨的負責人。有次他痛罵果夫先生，有句狠毒下流的話是：「國民黨內有C.C.，等於人已生了梅毒，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在場的人聽了，無有反應，更無人出面辯護，時局至此，夫復何言！

公務員上街擺地攤

民國三十七年年底，政府已遷往廣州。中央各機關留在南京的公務員，呈現無事可做的狀態。有的部會乾脆就關門大吉。青年部的全部辦公房屋讓給救國團使用。雖然他們的總務人員將大部份的辦公用具搬出去變賣了。

公務員無事可做，有的到馬路上去賣買銀元，所賺的收入比領到的薪水還多。各種銀元的價格隨時不同：大頭（袁世凱頭）最貴，小頭（國父孫中山頭）次之，鷹洋（墨西哥幣）又次之。其他的銀幣各定價格，時漲時落，上下午價格大不

相同。一般情形，漲多落少，正合投機者心理。既可賺錢，又富刺激，頗能吸引無事可做的公務員，參與此項破壞政府幣制信用的行列。

共黨大陸獲勝，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幣制信用，和破壞國民黨軍隊同樣重要。因為心理戰有時比物質戰更有力量。

攻擊果夫先生最厲害一着，是將他列為我國四大財閥之一。他是四大掌握中國財產人中的一個。理由是他任四大國家銀行之一的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

據說毛澤東在重慶會談時，常約會湖南老同鄉打小牌。某次談到國家前途，他說：共產黨遲早會勝利的，主要理由是國民黨已開始腐敗了。可是又說：自從他到重慶觀察後，獲勝的時間可能要延後了十年。原因在於二陳（果夫、立夫）不肯貪污（上述故事是張中寧同學講的，正確性如何？因為是二手資料。張是聽一位參與打牌的湖南長輩說的）。

二位陳先生來臺，在臺灣的人，應有資格來答覆這個問題。對於他們二位的廉潔，是沒有懷疑的。

民國三十七年底，政府已遷往廣州，而隨政府南下的人，究屬少數。絕大部份公務員仍留在南京。大家無公可辦，苦悶已極。我和王非尚在私立建國法商學院兼個職務，我兼訓導長，王兼訓導處組長。學生那時情緒已很不安。

王非時常約我上街走走散悶。看到街上到處擺着地攤，都是些準備離開南京的公務員，將不能隨身攜帶的家中物件，擺在街上廉價出售。東

西很便宜，就是無人購買。

夫子廟一帶聽清唱的人羣，有增無減。這亦屬解除苦悶方法之一。王非是北方人，愛聽平劇、大鼓等清唱。好在物價雖時在波動，而茶資尚未大漲。聽清唱，吃小館子，例如夫子廟的大衆點心油煎蔥餅、豆腐腦並未漲價。中、低級公務員尚有能力負擔。

某一晚上，我們正在聽清唱，忽然一個報童進來喊叫賣號外。頭條新聞報導總統蔣公辭職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積極進行和談。在場聽清唱的顧客，談論間皆認為和平有望，大家好像都鬆了一口氣。

十二月二十日，青年救國團撤退至杭州。同時報載行政院通過臺灣省政府改組，由陳誠繼任主席。

王非亦帶了妻子兒女到杭州。杭州政校同學較多。鄭邦琨等同學替我們二家安置不必付房租的二個小房間，暫時安頓家眷。

王非的女兒小非，那時才五、六歲，非常聰明可愛。上街已能向警察有禮貌地問路了。父母雖是東北人。她由湖州奶娘帶大，說一口道地湖州話。直到今天，我閉上眼尚能記起她的小臉蛋。很有些像我現在美國的小孫女模樣。此女如能不因其父受累（王非被押吳興公審槍決），尚活在人世，應該是四十五、六歲的中年人了。不知是被遷回東北遼寧營口，還是留在浙江？

那段時間，我和王非幾乎每晚都討論國家和個人的前途。結論相同的是：國民黨在大陸已完全失敗了。不同的是：應否去臺灣追隨陳辭公

？

王非不主張去臺灣，理由是大陸尚且失敗，臺灣一個小島，如何能抵抗共黨的進攻。我當時並非相信臺灣能有足夠力量抵抗共黨進攻，祇是身為一個國民黨員，尚有自由可走的時候，走一步算一步吧！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到了臺灣。陳辭公派我為省府專門委員，囑全力協助推動土地改革。很幸運，此項改革非常順利。減租於半年內完全成功。引起國內外人士同聲讚美。

廣西省政府同意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函請，接受試辦土地改革。但要求派人先往調查研究。蔣先生徵得陳辭公同意，借調我以農復會廣西土地改革特派員名義，於九月十六日飛抵桂林，率領政校地政系畢業同學刁偉芳，及一位廣西大學農經系畢業同學赴柳州附近一地區進行調查研究。

赴柳州前，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將軍，設宴歡迎我和三位美籍專家，並邀請在桂林的廣西士紳作陪。

席間有幾位桂系中代表人物，再三要求美籍專家傳達他們的意見給美國政府。他們說：「現在中國抵抗共黨，全靠廣西了。祇有廣西，還有力量能夠抵抗共黨，請不要錯失這個最後機會。」農復會我國專家不肯代為轉譯並解釋：「他們祇是農業專家，不可能向美國政府提供什麼意見的。」

共軍進展快速。十月初已進入廣西。桂系大軍全部崩潰，出乎一般人和他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總裁蔣公，就在此時以在野之身，飛往重慶，坐鎮指揮，吸引共黨大軍向西進攻。立夫先生等少數忠心幹部，追隨蔣公，帶領小型戰時內閣同往重慶。政校不少同學冒險參與。例如來臺的陳少書代表財政部，劉岫青、周之佐等代表內政部。最後立夫先生皆負責給他們飛機票，在共黨隊伍將達飛機場前，飛出四川成都。

總裁蔣公誘引共軍向西追擊，給臺灣有一年多時間，可以做政治建設（例如民選縣長，實施地方自治）、經濟建設（例如土地改革，糧食增產）等基礎工作。這是國民黨政府在撤退大陸前一次非常成功的戰略運用。

為國為民是功是過

民國四十年春，我任高雄縣長已一年，晉省述職，火車經過臺中時，忽然想起應該下車去看養病的果夫先生。

果夫先生來臺，就住在臺中。原因之一；臺中氣候適合他養病。原因之二，是房子問題。臺中市長陳宗熙兄，是侍三處的老部屬，他將市長公館讓出來，供果夫先生居住。

果夫先生睡在床上接見我。他精神還是很好。問我許多臺灣縣政方面問題，他亦很關心我的工作成績。他說最近看到報上載有省府記我一過的事，究竟詳情如何？

我向他報告事情的經過：起因在於軍事科（後改兵役科）將優待軍屬基金由科自己保管，而未繳入公庫。那時物價飛漲，放款利息很高。有

一天縣黨部書記長向我要求，請將這筆基金交由黨部保管，他們可以利用息金，補充縣部經費。

我不答應黨部要求，並認為這是一項舞弊行為，立即命令軍事科宋科長徹查。宋科長回到他辦公室十分鐘後，突然聽到槍聲。工友來報告：「宋科長拔槍自殺了。」

宋科長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辦事能力强，與鳳山各軍事首長關係良好，是我工作上的好幫手。他此次自殺，表示對部屬負責，我心裏非常難過。

民政廳主管科認定基金交由軍事科保管（經前任縣長核定），縣長應記過一次。但縣長記過，須經省府會議通過。民政廳長楊肇嘉老先生，忠厚長者，他說：「既是由前任縣長核定，就不應記現任縣長的過。」而且他個人認為現任縣長是一位好縣長。決定將此案撤回不提府會。而主管科却先發佈了新聞。

果夫先生聽我詳細報告後，表示安慰。

我臨別時，他提了一個我答不出來的問題，他說：「你在江蘇、湖北都做過事，比較一下，在這兩省做事，感覺上有什麼不同？」

我當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說：「陳辭公和果師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忠於黨國，忠於領袖。愛護部屬，愛護青年。」

至於他們的不同地方。今天回頭再想一想，或者可以說：「實在不多，勉強講一點，果師對部屬，比較重感情，比較寬容。辭公似較為嚴厲。有時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不過，在戰時。矯

枉過正，用得適當，是有其正面作用的。

民國四十年春，果夫先生壽晉六旬，八月廿五日逝世。時我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一期受訓。由周友端同學（曾任臺灣銀行總經理）提議同學自動參加，前往臺北南京東路市立殯儀館公祭。

參加公祭同學職業包括黨、政、軍、學各界，地域含有南北東西，平時政見並不一致。而對這位不顧自己身體，甚至不顧自己生命，一生忠貞黨國的果夫先生致最後敬意。

回憶五十年前在蘇州時，湖田清理處長張中寧同學（曾任湘西行政督察專員，來臺曾任師大訓導長）曾問我：「你知不知道C.C.組織？」我答：「不知道。」他說：「人家常認定我們政校同學屬於C.C.組織，應如何向人解釋？」我說：「關於政治組織的事，愈解釋可能誤會愈多。我們還是全心全意替國家做事，不去管什麼派系較好。」

果夫先生關心政校同學，亦是事實。政校師生較普通學校關係為深，亦毋庸否認。

有一天，我和張中寧同學又在臺北會面。他忽然說：「現在果夫先生死了，如果再有人問我是否屬於C.C.，我將不否認了。雖然我仍不知道什麼是C.C.組織。」

時隔五十餘年，國家、個人變化都很大。果夫先生一生為黨、為國、為民，是功是過，世人可能有不同評價。但就一個學生立場而言，他是一位負責的校務委員和教育長，是一位值得學生敬愛的師長。